

新时期文学十年

北京市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

学苑



新时期文学十年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主编：吕晴飞 副主编：吕恢文

学苑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颐赏胡同4号）

工程兵机械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10.5 字数235.900

1988年10月北京第1版

ISBN7—80060—048—3/G·18

定价：2.95元

目 录

文化讨论对文学研究的启示·····	高长印 (1)
文化视角与北京作家的创作·····	甘海岚 (16)
必要的张力	
——论当代文化中的一种小说结构·····	蒋京宁 (27)
新时期文学跨文化沟通的几个问题·····	张 泉 (47)
“人学”与文学的“向内转”·····	吕智敏 (68)
处在两峰之间的文学	
——论近几年文学发展势态·····	钱光培 (80)
作家主体精神的充实与调整	
——兼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	吕晴飞 (98)
在传统面前的抉择	
——试论苏叔阳的几个短篇小说·····	马玉田 (121)
追赶者的足迹	
——评浩然近十年来的小说创作·····	康凯 陆莹 (134)
走在生活的前头	
——谈王蒙创作的超前性·····	张丽航 (153)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欢愉之辞”	
——《臧克家评传》中之一节·····	张惠仁 (169)
骆宾基晚年的回忆散文·····	韩文敏 (179)
现代意识观照下的典型人物	
——锦云对狗儿爷形象的塑造·····	现 鼎 (197)

新时期十年北京文学的变迁·····	钱光培(203)
劫后十年戏曲理论四题·····	俞长江(212)
新时期杂文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	高起祥(226)
新时期北京业余诗歌创作漫议·····	马尚瑞(236)
影戏美学与影像美学	
——兼评当前我国电影艺术中的两种	
倾向·····	金汕 孟固(249)
新时期文学在国外·····	白水(271)
附录：新时期各种文艺奖评选、获奖名单	
·····	张未明辑(292)
后记·····	(334)

文化讨论对文学 研究的启示

高 长 印

从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开始，在我国学术思想界，逐渐兴起了一个文化讨论的热潮。如有的同志所说，“文化”一词，成为近来出现频度最高的理论用语之一。影响所及，使文艺界也在近几年掀起了一股文化热。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寻根小说的兴起，以及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反思，是文艺界文化热的两大表现。本文拟撇开这些具体问题，只就文化讨论对文学研究有哪些启示，从理论上作一些提纲挈领的探讨。着重于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

—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很多文学原理、文学概论等著作，虽然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作为论述的重点；但这个现实，是作为整体看待的现实。稍一分析，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现实是既多样又复杂的，有它的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就社会方面看，它包括各种经济成分，各种上层建筑，各种

— 1 —

意识形态，各种人与人的关系；而且所有这些方面，在主导的现状外，又都有过去的残余和未来的萌芽；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现实的极端错综复杂，使我们难以全面把握它。就社会方面而言，我们只能把握它的主要成分：经济、政治、文化。我们以前谈到文学同构成现实的主要成分的关系时，只强调文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尤其是与政治的关系，而排除文学与文化的关系。这种片面性，进而又被绝对化。认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就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由于抹煞文学同现实其它成分、尤其是同文化的关系，对文学反映现实的看法，文学表现形式的看法，文学社会功能的看法，都越来越狭隘化、单调化，最后导致文学理论的体系性的偏狭。

苏联学者卡冈指出，既然艺术所反映的世界表现为三种独立存在——自然、社会、人，既然文化是艺术所归属的最接近的环境，那末，艺术的功用能动性就能够表现在五种关系中：“艺术——自然”，“艺术——社会”，“艺术——人”，“艺术——文化”，“艺术——艺术”。这五种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既联系又区别的。①根据这个观点，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不能仅仅理解为是艺术与社会、社会中又仅仅是与政治的关系。必须从与艺术相对应的各种关系，在社会方面主要是经济、文化、政治关系出发，研究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以及其它有关问题。这样，必然带来两个结果，一是从多种关系，多种角度研究文学，如从哲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民族学等等方面，揭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二是

着重从文化关系、文化角度研究文学。所以把文化关系特别提出来，是由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中，具有特殊性。文学是文化现象，它归属于文化。文化现象与经济现象、政治现象相比，它的特点是内涵深邃，变化比较缓慢，具有很大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文化与其说是某种已经完成的结果，不如说是趋于完成的过程。中外文学史上很多复杂的典型，仅仅作政治观，从政治角度是解释不清楚的；只有转移到文化观，从文化角度说明，才能令人信服。说不尽的阿 Q，当然体现一定的政治现象和经济现象，但主要体现的是文化现象。那个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永远制定计划，永远无所作为的奥勃洛摩夫，也主要是一种文化现象的典型。列宁说：“俄国经历了三次革命，但仍然存在许多奥勃洛摩夫，因为奥勃洛摩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②阿 Q、奥勃洛摩夫以及其它类似的审美对象，不仅打着阶级的、社会的烙印，更凝聚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正由于它们饱含现实中的文化成分，体现生活中的文化现象，才有如此广泛的涵盖面，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它们是现实的，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的；又是超现实的，联结着过去和未来。我们强调从文化关系、文化角度研究文学，不仅因为以前我们根本忽视了这方面的研究，而且因为这方面的研究确实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有它的独特的价值。

二

由于文化的现实内容和它的实际范围，暂时还不清楚，所以文化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现定文化对象。“文

化”一词，有各种用法。广义的文化概念，是指与自然对立的人为系统，包括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概念的外延，甚至比现有的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总和还要大。以这个一般文化对象为主题的所谓文化学，旨在获得对文化总体的一般性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包括在文化之中，又独立于文化学之外。狭义的文化概念，是从特定的学科出发，对一般文化对象给予特有的把握。在社会知识领域，历史学、人类学、神话学、语言学、民族学、社会心理学、伦理学、文艺学等各种学科的代表人物，实际上都在从事文化的研究。他们给文化下的定义，其内容尽量接近自己这一学科，而不是另一学科所着重的那个方面。这种作法，只要不排斥其它对文化的说法，就是完全合理的。所以，文化的定义，数以百计、千计。研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如果不满足于空洞无物的泛泛而论，而是从一个方面，达到发展文学的目的，那就不能依据文化学的定义，追求似乎是客观的、统一的文化对象，而只能从文学这个背景出发，针对文学特有的问题，从文学角度规定文化对象。如果说，在广义的文化概念中，主体是社会；那末，在狭义的文化概念中，在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探讨中，主体则是文学研究者。这一点很重要，它确定了研究的对象不是一般文化，也不是历史文化、社会文化等等，而是审美文化。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是—致的。研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不能局限于把多样而复杂的文学现象与更加多样而复杂的文化现象简单类比，找出它们的相同处或相异处；或者指出两者是同形的，并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重要的，是把文学纳入文化系统当中，作为文化的一个成分规定文学的特征；同时按着发展文学的要求，根据文学的特

征研究特定的文化对象。在这个基础上，把联系文学与文化的审美环节——文化文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分析它的结构、功用和发展规律，从而为文学研究增加一个新的分支——文化文学学，以进一步加深对文学规律的认识，促进文学事业的繁荣。我们现在的研究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这应该是我们的自觉意识和努力方向。

文化讨论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反省传统。所谓反省传统，就是对传统进行再估价。大至认识民族的处境，寻求光明的前途；小至选择文学艺术的创新途径和最佳出路，都需要反省传统。反省传统极为重要，做起来却极为困难。因为有些问题不容易说清楚。譬如，什么是传统？传统是已经定型的东西还是正在形成中的东西？这次文化讨论中，有一种意见把传统看成是定型的东西，强调传统是过去形成的某种永恒的和不变的东西。这种传统观着眼于过去，用过去规范现在。这种意见的不合理处在于，它否定了传统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都是在历史中发展变化的。不但有量的发展和变化，而且有质的发展和变化。但这种传统观又有一定的合理处：不论是一千年的传统或一年的传统，确实不但总是与已往的社会集体经验相联系，而且总有一些确定的、甚至是固定的东西。所谓固定的东西，不是指不变的东西，而是指难变的东西，变化非常缓慢的东西。人是有文化的动物，人只有掌握传统的见识和传统的探讨方法，才能变得成熟。在这个意义上，人必须运用传统，必须使过去的东西对现在发生影响。

另一种意见，把传统看成是正在形成中的东西，强调传统是过去和现在不断交融会合的过程，亦即不断走向未来的过程。过去不是僵死固定的现成之物，而是有无数可

能性的巨大源泉。传统不但不等于“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且首先意味着它是“未来可能出现的东西。”这种传统观着眼于未来，着眼于创造，很有积极意义。但是，它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使未来与过去相脱离的缺点，存在着把可能性当成现实性的缺点。一种文化传统，尤其是它的深层结构，是历史的积淀物；在历史中产生，在历史中变革。任何新的创造都不能离开自己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马克思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③已有的东西不管是好是坏，或又好又坏，我们只能有效的甚至最大限度地影响它，制约它，改变它，却不能废除它。不能废除的东西总会发生作用，使现在和未来带着过去的成分、因素或影子。

与上述两种意见不同，我的理解是，传统不是定型的东西，尽管它有很大的稳定性；传统是可塑的东西，尽管要使它面貌一新，绝非一代人的事业。从文化文学学的角度看，需要探求两个传统：一个是文化传统，一个是文学传统。两者既有联系又不能等同。它们的形成、流向和演变，既有共同的规律，又有各自特殊的规律。用文学传统代替文化传统，或用文化传统代替文学传统，都是简单化的、有害的作法。为了确定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各自的特点及其相互联系，需要从宏观或微观的结合上做很多

工作。

三

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自身的价值如何评价，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它们做出定性式的结论。而任何定性式的结论，如说好或不好，都不符合实际，都不科学。因为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所以我们避开这个问题，只谈判断传统本身价值的标准是什么。

在文化讨论中，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标准是西方化。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通过中西文化和中西文学的比较，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长处和短处就明显可见了。但是，历史证明，比较往往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可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也可以彼之长攻己之短。即使根据西方的价值观念，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缺陷揭露出来，也无补于根除这些缺陷，因为不可能根据西方文化和文学来改造中国文化和文学。所以，中西比较，虽然有助于认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特点、基本形态及其本质，却不能据此判断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的真实价值。

另一种意见认为，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进行价值判断，不能用外国文化和文学作标准，只能从中国文化和文学本身出发，依据中国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需要为标准。反省传统的目的，是以此为基础建设新文化新文学。文化和文学的生命力不能从外部输入，只能从自身生发开来。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不在模仿，而在创新。这种意见虽有偏颇之处，却非常值得重视。

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价值，依据社会实践的需要，从两者的相互比较中，可以窥其大概。周谷城同志说：

“中国文化的精华，如文学、诗词、绘画、雕刻、建筑等一类东西，决不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衰退，恰好相反，它们将越来越活跃，比任何时候都发达。”④这个见解，实际上也是比较，我以为是可以接受的。从文学艺术是中国文化中比较精华的部分这个判断，可以引申出两种理解：一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由于缺少民主和科学的因子，因而是应该否定的；而中国文学艺术却是应该肯定的。二是中国文化传统应该肯定，中国文学传统也应该肯定。它们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但部分优于整体。这两种理解，我倾向于第二种。但说中国文化传统大体上是好的，中国文学传统大体上是更好的，只突出了它们相似的一面，而忽略了它们差异的一面。实际上，在判断传统价值的标准这个问题上，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差异，比它们的相似更引人注目。中国的文化传统，虽然不能简单说它是儒学传统，或儒道互补，但从中国在近代落后了这个事实看，说中国文化传统缺乏使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内在机制，大概没有大错。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总是痛感文化传统的包袱太沉重，以至在今天，它仍然束缚着中国的经济、政治改革，拖着我们前进的步伐。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加以改造。改造的重要途径，是向世界开放，向世界先进文化学习。也可以说，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尤其是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冲击，是把中国前现代化的文化系统改造成现代化的文化系统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中国的文学传统也需要改造，需要从异质文学中吸取养料，以利于自己的发展。但中国文学的改造，更多的是与社会生活相合，挖掘自身的潜力，在时代的推动下进行。

它的立脚点是纵向承传，而不是横向吸取，虽然后者也是文学进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中国文学，不论在古代，在现代，与其它国家的文学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有特别光彩之处。可以把文化区分为前现代化系统、现代化系统和后现代化系统，却不能以同样的模式区分文学。中国文学与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学，有共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衡量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地位的高低，标准不是看中国文学是否符合发达国家的特点，而是看是否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的特点。西方现代派文学，是上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文学中门类繁多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肯定现代派文学的认识价值、社会意义和借鉴作用，但并不认为中国文学也将走现代派的道路。因为现代派文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并不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产物。鲁迅的话，“先成为地方的，然后才成为世界的”，重新赢得了人们的赞同。世界文学不能抛开各国、各民族文学的丰富性和差异性而抽象存在。世界文学的发展，既是各国、各民族共性、统一性的发展，也是各国、各民族个性、独特性的发展。所以，评价中国文学传统，要反对以发达国家为先进，以中国为落后的观点；要反对只要是新的就好，只要是旧的就坏的观点。要知道，中国文学的精华，在于它的民族精神。因为归根结底，中国文学首先是中国人用中国文字，表现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只有真正画出中国人的心灵，中国文学才能走向世界。当然，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一样，有传统，又没有固有的传统。中国人的心灵，中国的民族性等等也在变，但这些都是文化价值领域里的变化，比较缓慢。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个国家经济、文化、政治联系的日益加强，甚

至中国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都不能使中国人的心灵和民族性与之同步变化。中国作家应当关心人类共同的问题，应当有世界意识，但首先和主要的，是关心中国的事情，有中国意识。有了中国意识，在深入挖掘、批判继承和发扬光大中国文学传统上下工夫，又与世界的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表现出中国文学的优势。

四

中国文化的特征、基本精神和时代、地区差异与文学的关系，也是个复杂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既交流渗透，又独特自立。用汉民族文化代替中国文化，是以偏概全。即以中国文化专指汉族文化而言，汉族文化几千年来不断演变，先秦、两汉、魏晋、宋明，各时代的差别很大。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也都存在着好几个文化区；各文化区不但有差别，有的甚至完全不同。^⑤这些情况很重要，文学研究应充分注意。譬如，常有人说中国缺少史诗，这对不对呢？显然不对。只能说中国的汉民族缺少史诗。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史诗很发达，而这些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边远地区。可见，考察历史上的文学艺术，不能忽视地域性的因素。文艺的地域学研究，有助于从对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扩展到以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的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金克木同志说：“不仅是非汉族的民族文艺有地域性，汉族文艺也不能只顾历史而不顾地理。地理不只是指地区，而是兼指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⑥这种全方位研究，对文学是迫切需要的。

有的同志根据中国文化存在着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这

个事实，否认中国有传统文化，当然也不承认有这种文化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精神。这种意见值得商榷。我认为，强调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很必要，如上所述，对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都很有意义，但这并不排斥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文化有大致相同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精神。至于这个主要特征和基本精神是什么？当然很难求得一致意见，而是见仁见智，各说其是。把众多的、难免互相抵牾的意见从层次上区分一下，我看可分为两种：一种侧重表层现象的概括，一种侧重深层内核的揭示。前者虽是文化讨论的重要部分，立论很多，如说“礼”是中国文化世代相沿的主要形态，或中国特有的人文主义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或中国文化是一个以伦理意识为中心的系统，等等，但对文学研究关系不大，可以不去管它。后一种与文学研究大有关系，值得认真思考。李泽原同志认为孔子创造的仁学思想，终于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孔子的仁学思想是一个整体模式。“它由四个方面或因素组成，诸因素相互依存、渗透或制约。”“四因素分别是：（一）血缘基础，（二）心理原则，（三）人道主义，（四）个体人格。其整体特征是（五）实践理性。”⑦顾晓鸣同志认为“象”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基因”。因为中国思想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渊源是《易》（包括经和传）；《易》的核心是“象”，“象”的概念以及以“象”为中心的各种学说，是中国传统的“抽象概括方式”的集中体现。⑧这两种说法，具体内容不同，但在层次和角度上我认为是一致的，讲的都是思维方式。实践理性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象”也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两者结合起来，大约概括

了中国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不是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核，主要体现在它特有的思维方式上。如果这个判断能够成立，那末，研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则必须研究文学与思维方式的关系。中国文学的特点，如创作的伦理化、理论的经验积累形态；不重视本体论的研究，而强调价值论的判断；重比兴，轻摹仿；以人人为本位，以具象为特征等等，都与中国各民族尤其是汉族的思维方式的点密切相关。而汉族思维方式的特点，除了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生产条件等外，又与汉族特有的语言——意象的使用有关。从这个方面对我国的文学，包括古代和现代，包括创作和理论，进行历史的、深入的研究，可望获得有创见性的成果。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为人所注意，这广度和深度都不够。相信以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会越来越多，收获会越来越大。

五

文学的基本属性，与其说是阶级性，不如说是社会性。社会性包括阶级性和国民性。我们的文学著作，常常充分肯定文学的阶级性，谈得很多；否定以至不承认文学的国民性，谈得很少。其实，所谓国民性，与常说的民族文化性格，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至人民性、民族性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民族文化性格是内在的东西，国民性是它的外观。从文化文学学的角度看，表现和研究国民性，与表现和研究阶级性一样，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国民性问题，应该提到研究日程上。

在人类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工业的使用，技术的进步，社会范围的扩大，使人们的关系越来越复杂。

另一方面，从风俗习惯到道德、法制、宗教、艺术等，一种超个人的力量，也规范着社会各集团，使该集团每个人的行为、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越来越相同或相似。处于文化两极的价值体系和技术体系，以语言和社会结构为媒介形成一个文化结构体。这个结构体具有不同的形态、类型和发展史。国民性就是这种结构体所表现的类型。由于技术体系在各民族间易于借用、传播，所以它不是国民性的主要内容。国民性最明显地表现在价值体系中，表现在各民族的价值性的文化当中，这种文化属于规范的、非积累的、人格的、主观的东西。⑨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看，阶级性和国民性都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意识形态。不同的是，国民性并不完全和直接的服从于、依赖于经济和政治变革，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精神存在，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它既不是一成不变的先验结构，又经历了社会历史的种种变异，成为一种比较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具有适应各种不同阶级内容的功能和作用。

因此，不论从历时态看或共时态看，国民性都有二重性，即保守性的一面和变动性的一面。“我国国民性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与中国文化系统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是同步的，前者可以说正是后者的升华与结晶。”⑩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国民性对社会的稳定和文明的延续、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只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社会结构变了，国民性却固守不变，才使国民性中落后、消极的一面，日益突出地显露出来。文学界有一种现象，在论述文化问题时，谈到儒、道、佛、诸子百家，结合历史考察，探寻演化轨迹，一般就事论事，态度比较冷静，容易看到其积淀物的两重性。而一转到文学领域，一提到国民性，